

《印度香藥談》與中西醫藥文化交流

董少新*

15-16世紀的葡、西航海運動，對世界醫學史產生了重大影響。世界各地的傳統醫藥在這個時代實現了洲際交流，新藥新配方層出不窮，一些具有航海時代特徵的醫藥學著作和學者也不斷出現。葡萄牙藥物學家加西亞·達·奧爾塔（Garcia da Orta）和他的《印度香藥談》便是其中一個最著名者。本文就《印度香藥談》中與中國有關的部分內容，參考其它中外文獻，條分幾項，粗略研究之，以觀察葡萄牙人出現在印度及遠東之後的16世紀，中國與西洋醫藥文化交流的痕跡，以及中西關係的新變化。

奧爾塔及其《印度香藥談》

奧爾塔1499或1500年出生於靠近葡西邊境的葡萄牙阿倫特茹地區小城埃爾瓦什（Elvas）。⁽¹⁾他自小對醫學感興趣，約1515-1523年期間在西班牙薩拉曼卡（Salamanca）大學和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（Alcalá de Henares）大學攻讀藝術、哲學和醫學，所學醫學課程主要為歐洲、阿拉伯古典醫學，包括希波克拉底斯（Hippocrates）、蓋倫（Galeno）和阿維森那（Avicenna）的著作，也受當時醫學最新發展的影響，比如反希波克拉底斯運動⁽²⁾，獲得學士學位後，於1523年返回到葡萄牙。他在卡斯楚德維德城（Castello de Vide）通過葡萄牙主治醫師（physico-mor）的考試，並在那裡行醫幾年；1526年到里斯本，1532年在里斯本大學謀得教席。

1534年3月，奧爾塔作為未來葡印總督馬爾丁·阿豐索·德·索薩（Martim Affonso de Sousa）的私人醫生，乘“王后”號船東航，於9月抵達印度果

阿。1534-1538年間，奧爾塔跟隨馬爾丁·索薩，足跡遍及次大陸沿海的葡萄牙各據點。從1538年直至1568年去世，他一直在果阿行醫，甚少離開。他在果阿開診所，並且成為果阿王家醫院（Hospital de el rei）的醫生。他一度成為德干王國的御醫，且是多任印度總督的私人醫生。他在行醫的同時，也做藥材、珠寶和玉石買賣。⁽³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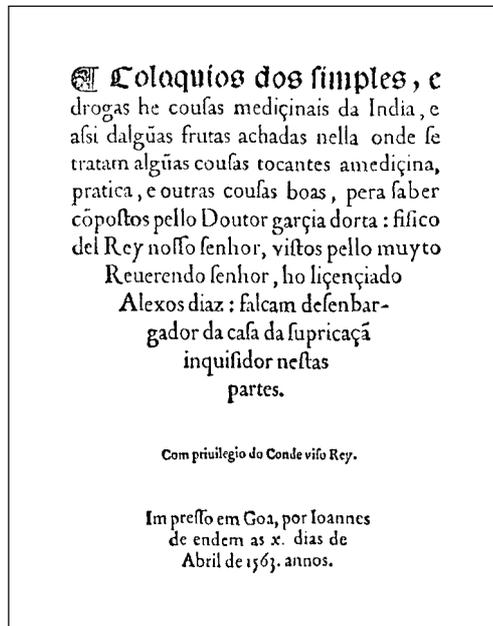
據說奧爾塔一生祇著有一部著作，即《印度香藥談》⁽⁴⁾。該書1563年4月出版於果阿，是西方藥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，奠定了“熱帶醫學”的基礎。全書共59章，以對話方式記述80多種印度及遠東藥物，並談到每種藥物在各種語言中的名稱、性狀、用法以及市場行情等等。對話主要是在奧爾塔和若阿諾（Ruano）之間進行的。若阿諾是奧爾塔虛構的人物，是希臘、羅馬古典醫學的代表。奧爾塔以阿拉伯、印度醫學和自己的實踐經驗，對古典醫學進行修正。《印度香藥談》不僅是世界藥學史的重要文獻，對語言學、貿易史亦有重要參考價值。

《印度香藥談》出版後在歐洲醫藥學界引起強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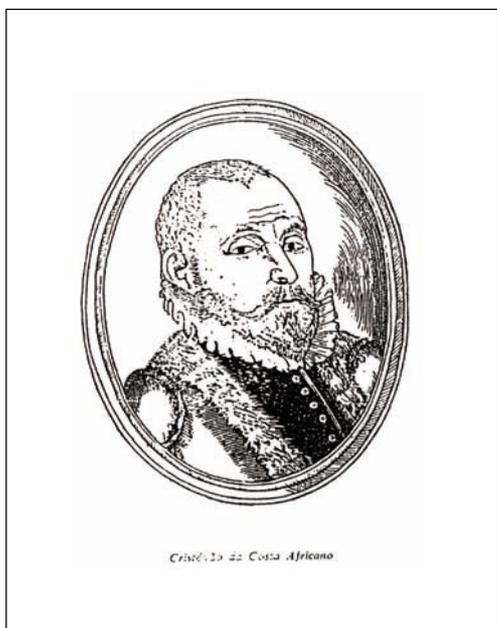
*董少新，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2000級博士研究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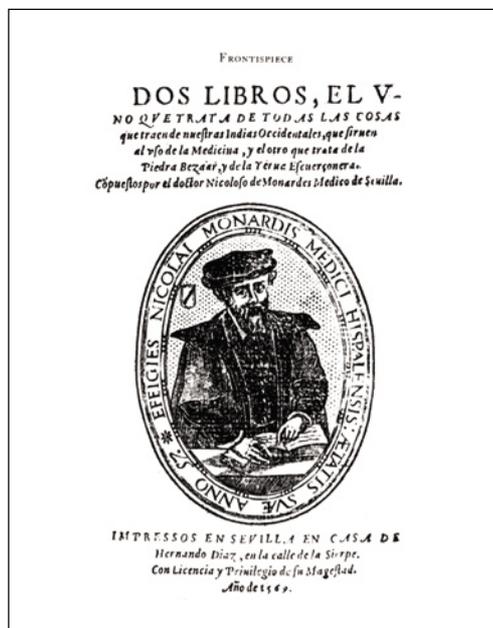
克里斯托旺·達·科斯塔：《東印度醫藥》
1578年 Burgos 初版封面



奧爾塔《印度香藥談》1563年果阿初版封面
圖片來源：Conde de Ficalho 校注，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 por Garcia da Orta, Imprensa Nacional, Lisboa, 1891.



克里斯托旺·達·科斯塔畫像



尼古拉·莫納爾德斯《西印度醫藥》1569年塞維利亞初版封面，這是現存唯一的莫納爾德斯畫像。
圖片來源：Boxer, C. R., *Two Pioneers of Tropical Medicine: Garcia d'Orta and Nicolás Monardes*, The Hispanic & Luso-Brazilian Councils, London, 1963.

反響，不久便有了多種譯本。1567年由卡婁羅·克魯西奧（Carolo Clusio, 1526-1609）譯成拉丁文，該版本於1574、1579、1593和1605年再版；1576年意大利文版問世，至1605年意大利文譯本至少有八個版本；1602年首個法文本出版⁽⁵⁾；1577年出版英譯本，並有一個珍貴的西班牙文譯本行世。⁽⁶⁾

《印度香藥談》與中藥西傳

加西亞·達·奧爾塔從沒有到過錫蘭以東，但他的著作卻紀錄了許多關於中國尤其是一些中藥知識。這些知識主要來自各國藥材商人、印度醫生以及印度、阿拉伯、波斯的醫學著作。和許多同時代作者一樣，奧爾塔在《印度香藥談》中也表現出對中國的敬慕，如他在論述“閉鞘薑”的一章中，讚美中國法律、科舉制度和印刷術。⁽⁷⁾在第十二章羅列了每年販運到印度的各種中國貨，有銀床架、豪華餐具、散絲和絲綢、黃金、麝香、珍珠、銅、水銀、辰砂，最少的是瓷器，但“價格往往是白銀的兩倍”⁽⁸⁾。下面從《印度香藥談》中選取幾種典型的中藥略加論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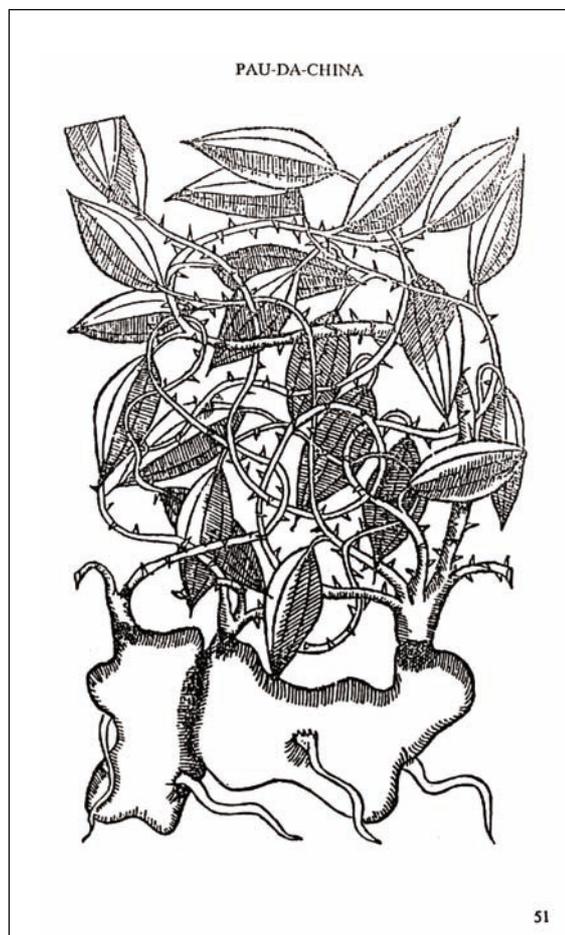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土茯苓

土茯苓在《印度香藥談》中被稱為 Raiz da China，直譯即“中國草根”。它是治療梅毒的特效藥，明朝中葉外科專家薛己氏（1480-1558）在他著的《外科心法》（1525）中，已經有用土茯苓治療楊梅瘡的記載。⁽⁹⁾奧爾塔說，“中國人用它治療梅毒，並於1535年將其帶到這裡以治療此病。”⁽¹⁰⁾當時奧爾塔的終生朋友馬爾丁·阿豐索·德·索薩在第烏（Diu）軍事據點，坎貝（Cambaia）蘇丹卜哈多爾（Bhadur）在被土茯苓治癒後，將該藥贈送給索薩。土茯苓在印度很快傳播開來，使奧爾塔從葡萄牙帶來的美洲大陸新藥瘡木（guaiacam）降低了聲譽。開始時土茯苓的價格昂貴，每甘達（ganta，相當於24盎司）要10克魯扎多（Cruzado），但後來由於商人大量販入，價格大大降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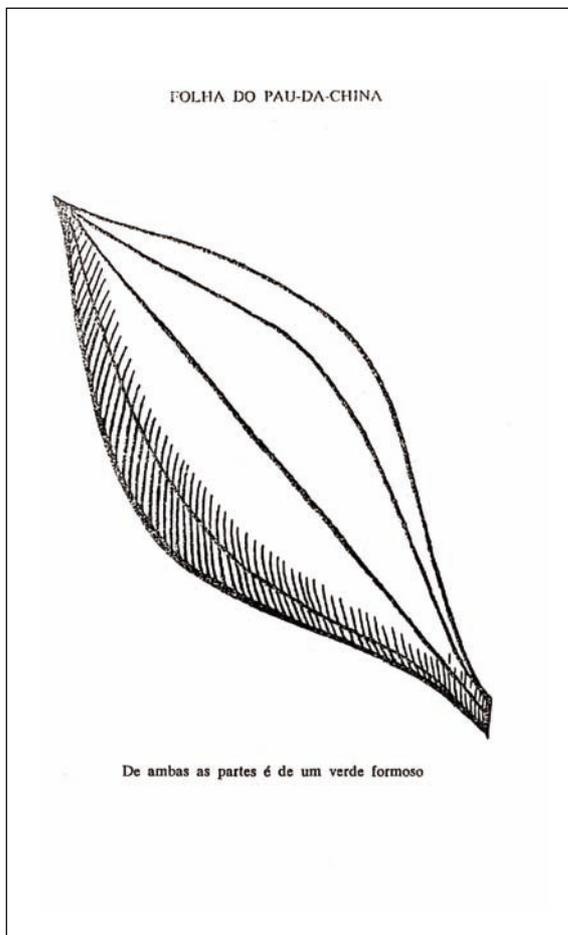
土茯苓傳到印度後，於同年便傳到了歐洲，並

因為治癒了西班牙國王卡羅斯五世（Carlos V）而譽滿歐洲。著名醫學家、《人體解剖學》的作者維薩留斯（Vesalius）於1546年發表文章，贊揚土茯苓的治療功能。⁽¹¹⁾

梅毒是由哥倫布船隊第二次從美洲大陸返回西班牙（1494）時攜帶至歐洲的，法國國王查理三世（Charles III）入侵意大利時，軍隊中有許多西班牙人，梅毒隨之傳入法國和意大利。葡萄牙人到達印度後，將梅毒帶到了亞洲，並於16世紀初傳染到了中國。關於梅毒的傳播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那就是它的名稱不斷隨着地域而發生變化，先後被稱為西班牙瘡（morbo hispanico）、高盧瘡（morbo galico）、那不勒斯瘡（morbo napolitano）。傳到



土茯苓



土茯苓葉

印度後，由於穆斯林稱葡萄牙人及歐洲白種天主教徒為“佛朗機（franguy）”，便將梅毒稱為佛朗機瘡（mal dos frangues）。（¹²）梅毒傳入中國之始，由廣東而入，便被稱為“廣瘡”。（¹³）這在世界疾病史上可說是極罕見的現象。梅毒在中國的迅速流行，引起了中國醫學界的震驚，很快研究出對癥的“輕粉”（汞劑）藥方。但由於該方容易引起汞中毒，於是多採用以土茯苓為主藥的藥方。（¹⁴）大航海使一些傳染病在世界範圍泛濫，同時也使治療藥物藥方在世界範圍得到迅速傳播。

二、大黃

大黃為傳統名貴中藥之一，產於河西、隴西、川蜀一帶。早在10世紀的阿拉伯文獻中，就有對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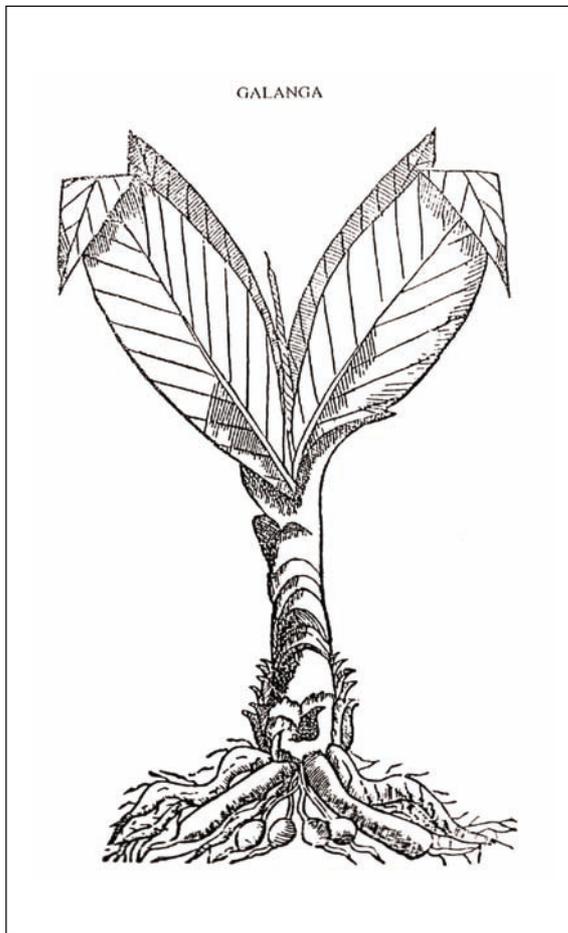
黃的記載。大黃在明代仍是中國向西方輸出的重要商品之一。奧爾塔在柯枝（Cochim）首次見到大黃。他在《印度香藥談》中記述了大黃（ruibarbo）西傳的兩條途徑（¹⁵）：一是由陸路經烏茲別克（Uzbeque）首都撒馬爾汗（Camarcandar）而至印度，或直接經中亞至威尼斯轉運到西班牙；一條是由海路，首先由大黃的產地運到廣州，商人在廣州購買大黃，並用船運至霍爾木茲（Ormuz），通過一段陸路運至威尼斯，再由威尼斯運往亞歷山大。葡萄牙人則直接從印度購買運回葡萄牙。奧爾塔比較了兩條途徑，認為由海路運輸易於保存，質量優於由陸路運輸。但奧爾塔對大黃的藥性所知有限，他在該章末段說：“我希望瞭解更多一些，因為現在中國已經與葡萄牙人有更多的交流了。”奧爾塔在他的著作中沒有直接提到澳門，不知此處是否指葡萄牙人已開始入駐澳門？

在奧爾塔之前，有一位葡萄牙藥劑師已經將大黃的資訊向葡王唐·曼努埃爾（D. Manuel）匯報了。這位藥劑師便是葡萄牙第一位訪華使節多梅·皮雷斯（Thomé Pires）。里斯本東波塔檔案館保存着一封皮雷斯1516年1月27日於柯枝致葡王的信函，向其匯報了在印度收集到的二十多種藥物，其中第二種便是大黃。他稱大黃“產於韃靼和土耳其地區”。（¹⁶）

三、高良薑

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曰：“陶隱居言此薑始出高良郡，故此得名。按高良，即今高州也，漢為高涼縣，吳改為郡。其山高而稍涼，因以為名，則高良當作高涼也。”（¹⁷）奧爾塔《印度香藥談》說：高良薑（galanga）“在阿拉伯語中稱為 calvegiam，而毛里塔尼亞（Mauritanos）人稱其為 chamligiam 或 galungem。”在阿維森那（Avicena）的著作中稱為“calungiam”。（¹⁸）所有這些名稱，顯然都是漢名“高良薑”的音譯。

奧爾塔在他的著作中將高良薑區分為兩種，“一種塊小，甚辛，來自中國，並從這裡（印度）被運送到葡萄牙和歐洲其它地方；一種塊大，不如第



高良薑

一種辛香，產於爪哇（Jaoa）。”⁽¹⁹⁾並說來自中國的高良薑深受歡迎，更多地被使用，而來自爪哇者較少使用。

在《本草綱目》中，高良薑主要用於治療霍亂、瀉痢一類疾病。儘管奧爾塔並沒有說明高良薑的用途和用法，但由於當時印度霍亂頻發，而高良薑又十分受歡迎，所以可能主要被用於治療霍亂。《印度香藥談》中有許多治療各種霍亂、瀉痢的藥方，如閉鞘薑、硅孔雀石等，這是西方人剛到印度，對此疾病無任何免疫力的一種反應。中藥對葡萄牙人適應當地環境起一定作用。至19世紀末，儘管高良薑在歐洲已不作藥用，但仍是貿易物品之一，且被用作一種興奮劑，主要流行於俄國。⁽²⁰⁾

四、樟腦、龍腦

樟腦是中藥，龍腦是西藥，但由於在明代兩者有着密切關係，故將龍腦與樟腦一並記述。

樟腦又名韶腦，因出韶州和漳州而得名。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曰：“樟腦出韶州、漳州。狀似龍腦，白色如雪，樟樹脂膏也。”⁽²¹⁾奧爾塔《印度香藥談》第十二章用較大篇幅論述了“camfora”，他將此物分為兩類，一類來自中國，即為樟腦；另一類產自婆羅洲（Burneo），即是龍腦。在現代葡語中，“camfora”專指樟腦。西方學者一般認為，該名是對漢名的音譯⁽²²⁾；而以“borneol”指龍腦，顯然是譯自“婆羅洲”。

奧爾塔說，“樟腦不是來自於商人聚集的廣州，而是來自於商人較少前往的漳州（Chincheo）。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告訴我，樟腦豐富的產量使其在中國價格相當低廉。其他人告訴我另一種情況，說樟腦球是一種混合物，因為龍腦是向泉州販賣的商品，當地人說他們進口龍腦是為了與廉價的樟腦相混合。”⁽²³⁾這段話告訴我們，明代漳州港是外銷樟腦和進口龍腦的集散地；中國商人進口龍腦的目的之一是將其與樟腦混合，以次充好，以博得好的價格。而這一點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“龍腦香”條中也同樣指出了：“今人多以樟腦升〔片？〕打亂之，不可不辨也。”⁽²⁴⁾

龍腦在唐代已經傳入中國。據《本草綱目》載：“龍腦香及香膏出婆律國。……今惟南海番舶賈客貨之。……唐天寶（742-756）中交趾貢龍腦，皆如蟬、蠶之形。彼人云：老樹根節方有之，然極難得。禁中呼為瑞龍腦，帶之衣衿，香聞十餘步外，後不復有此。《江南異聞錄》云：南唐保大中貢龍腦漿，云以縑囊貯龍腦，懸於玻璃瓶中，少頃滴瀝成水，香氣馥烈，大補益元氣。”⁽²⁵⁾《本草綱目》還記載了一條奇聞：“宋史熙寧九年（1076），英州雷震，一山梓樹盡枯，中皆化為龍腦。此雖怪異，可見龍腦亦有變成者也。”⁽²⁶⁾

有趣的事，《印度香藥談》中也論及打雷與龍腦的關係。若阿諾問道：“龍腦會在這一年比另一年

生得更多嗎？因為有人跟我說打雷越多，生得就越多，反之則越少。”奧爾塔回答道：“這是阿維森那、謝拉彼昂（Serapiam）和阿額西奧（Aecio）的誤導；……打雷並非生龍腦的原因，除非是意外或偶然發生。”⁽²⁷⁾李時珍和奧爾塔都沒有完全否認雷電生龍腦的可能性，中西兩則奇聞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有意思而又不易解決的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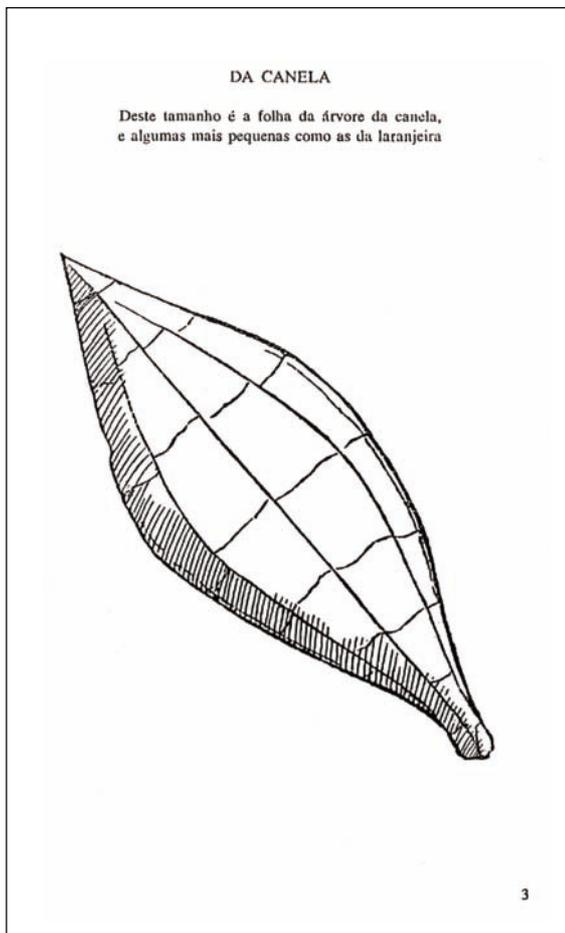
五、桂皮

奧爾塔在《印度香藥談》中，將產自錫蘭（Ceilam）、馬拉巴爾（Malavar）和爪哇的桂皮（canela）歸為一類，並記述當時桂皮的貿易路線說：“中國商人從他們的本土帶上黃金、絲綢、瓷器、麝香、銅、珍珠、明礬以及其它許多商品，到

馬六甲（Malaca）後賣出一部分，並在那裡購進檀香、豆蔻、豆蔻脂膏，丁香、蘆薈等，然後到錫蘭和馬拉巴爾，將他們所帶的大部分貨物賣出，並在錫蘭買進在當地優質而廉價的桂皮；而沒錢的水手們則在馬拉巴爾和爪哇帶上大量次品桂皮，並將胡椒和小豆蔻以及其它藥材停放在馬拉巴爾；他們將所有桂皮販往霍爾木茲和阿拉伯海岸，有商人在這些地方買進桂皮，再販賣至亞歷山大、阿萊坡（Alepo）和大馬士革（Damasco）。……錫蘭的桂皮最佳，葡萄牙祇進口錫蘭桂皮；在霍爾木茲，由於進行買賣的商人來自中國，所以他們稱其為 darchini，意思是中國木（páo da China）。這樣，亞歷山大以及上述的地方都有桂皮出售，為了向希



桂皮樹



桂皮樹葉

臘人出售。他們將名稱改為 cinamomo，意思是來自中國的香木（páo cheiroso）。”⁽²⁸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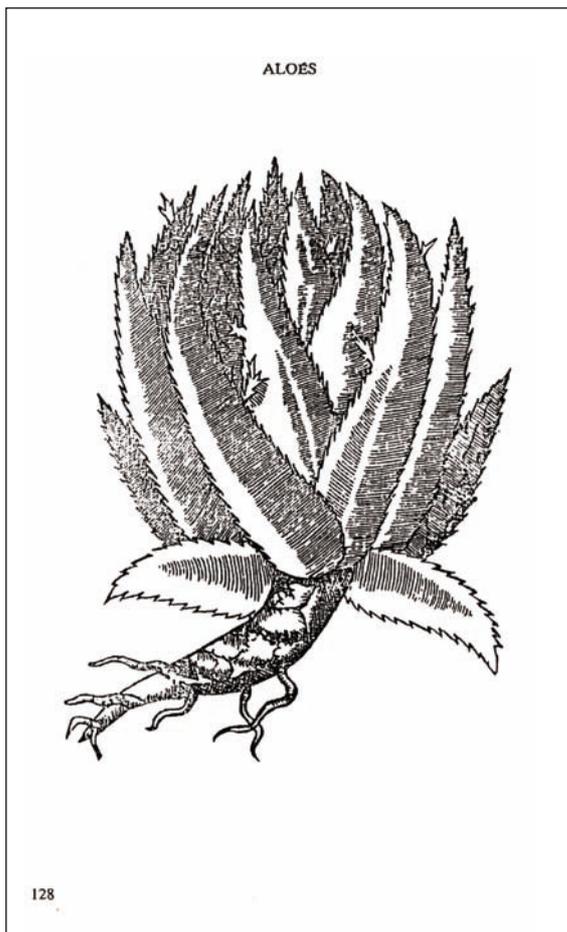
可見當時做桂皮貿易的商人主要是中國人，並且由於他們的貿易，桂皮被遠銷至地中海地區及西歐。但奧爾塔認為中國不產桂皮⁽²⁹⁾，這是個不小的錯誤。中國嶺南廣州、交州、桂州等地均生長桂樹。儘管還無法確定西方語言 darchini, cinamomo 等詞的產生是由於中國商人的販賣，還是由於桂皮也來自中國，但桂皮是傳統中藥十分重要的一種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⁽³⁰⁾有趣的是，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也未提南亞桂皮的存在，並將李珣《海藥本草》中的“天竺桂”說成是“此即今閩、粵、浙中山桂也，而臺州天竺最多，故名。”⁽³¹⁾李珣說“天竺

桂生南海山谷中，功用似桂，其皮薄，不甚辛烈。”李珣為唐末五代人氏，是波斯賈人李蘇沙之後，880年隨僖宗入蜀，居川四十五年以上。弟李玘是香藥商人。李珣曾遊歷南方，晚年撰成《海藥本草》六卷（已佚）。《文獻》1983年刊載馬福月《海藥本草》輯佚118條，藥物多從海路市舶至於中土。⁽³²⁾據此背景，我認為李珣所說“生南海山谷中”之“天竺桂”乃錫蘭所產之桂。如果是因“臺州天竺”而得名則應為“天竹桂”。

中國與西域有着悠久的藥物交流歷史，特別是在宋元時代，許多中藥被大量出口至南亞和西亞地區，對這些地區的醫學產生重要影響，如阿維森那（Avicenna, 980-1037）《醫典》一書（約成書於11世紀初）中，載有大黃（Rawand-Chini）、桂皮（Dar-Chini）、花椒（Kababa-Chini）、黃連（Mamuran-Chini）、中國茴香（Badvan-Chini）、天竹黃（Chop-chini）等藥物及其用法，當均為中國藥物或主要由中國輸去者。波斯人阿布·曼蘇爾·穆瓦法克（Abu Mansur Muwaffaq）約於975年所著的《醫藥概要》一書中，也記述了肉桂、土茯苓、黃連、大黃、生薑等中國藥物。⁽³³⁾中藥在明代仍是重要的出口商品，這在《印度香藥談》中已有所體現。所不同的是，16世紀葡萄牙人出現在南亞和遠東，並逐漸成為一支重要的商業勢力，他們將東方的藥物（包括中藥）經新航路直接販運到葡京里斯本，然後從那裡擴散到歐洲各地。當時里斯本有“印度之家”（Casa da India），是東方藥物的交易所和集散地。⁽³⁴⁾

《印度香藥談》與西藥中傳

16世紀輸入中國的西藥，仍然以阿拉伯、印度、波斯和東南亞藥物為主，西洋藥物和“新大陸”美洲藥物此時尚鮮有輸入中國者。但一些明代輸入中國的傳統西域藥物，也體現了東西關係新的變化。下面從《印度香藥談》中選取幾種典型的明代進口藥品略加論述。



蘆薈（本文中藥圖片來源：Jaime Walter 校注，*Tratado das drogas e medicinas das Índias Orientais* por Christovão da Costa,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, 1964.）

一、龍涎香

龍涎香一般採自南亞馬爾代夫群島一帶，但到底為何物，自古就有多種說法。奧爾塔《印度香藥談》綜合當時阿拉伯、印度地區各種說法，認為不是鯨之精或海中其他動物的糞便或唾沫，而是海底之泉將石頭層層包卷而成⁽³⁵⁾，其形成過程有類琥珀。奧爾塔稱龍涎香為 *ambre*，而該詞葡語意為琥珀。*ambre pardo*（直譯為褐色琥珀）或 *ambar cinzento*（直譯為灰色琥珀）為龍涎香。現代學者一般認為龍涎香是抹香鯨腸結石。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曰：“龍涎，方藥鮮用，惟入諸香，云能收腦、麝數十年不散。又言焚之則翠煙浮空。出西南海洋中。云是春間群龍所吐涎沫浮出，番人採得貨之，每兩千錢。亦有大魚腹中剖得者。其狀初如脂膠，黃白色。乾則成塊，黃黑色，如百藥煎而膩理；久則紫黑，如五靈脂而光澤。其體輕飄，似浮石而腥臊。”⁽³⁶⁾“龍吐涎沫而生”祇能是商人們為抬高價格而編造的謊言；但“大魚腹中剖得”卻十分可信。至於《努韋理（Nuwayri, ? -1332）百科全書·香料的配製》中所披露的合成龍涎香，⁽³⁷⁾我認為是根據龍涎香“收腦、麝數十年不散”的特性，將龍涎香與其他香藥混合而成的一種合劑，並非純正的龍涎香。

宋代進口的諸香中，以龍涎香為最貴。據宋張世南《遊宦記聞》卷七：“諸香中龍涎最貴重，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，次等五、六十千，係番中禁榷之物，出大食國。”張知甫《可書》則記載，真龍涎香運至京師開封後，其兩錢售價更高達三十萬緡，當時明節皇后出價二十萬緡，海賈尚不出售。⁽³⁸⁾明代龍涎香的進口價格仍然非常昂貴，但由於葡萄牙商人的競相販賣，價格有所降低。奧爾塔說：“尤其令人吃驚不已的是，在華人中它（龍涎香）價值連城。是我們葡萄牙人將龍涎香販往中國的。一斤，合20盎司，可售1500克魯扎多。因為我們的人販去太多了，所以價格掉了下來，且愈來愈低，原因是大家競相販賣此貨。”⁽³⁹⁾

對於如此昂貴的香藥，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並沒有記述它的主治功能。這是因為，龍涎香主要

為煉丹師所用，是煉取長生不老藥及春藥的重要原料。明嘉靖皇帝曾長期無子，便迷信丹術，一再命人尋找龍涎香。當時龍涎香貿易為葡萄牙人所控制，他們利用明王朝尋香心切的機會，以龍涎香作為救贖葡囚及爭取貿易據點的砝碼，使龍涎香成為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重要因素之一。關於這一點，金國平與吳志良二位已有詳細的論述。⁽⁴⁰⁾

二、保心石

墨西哥來華方濟各會士石振鐸（Pedro de la Piñuela, 1650-1704）在所著《本草補》中有“保心石”一條，曰：“鹿獸遇槍箭蛇蠍諸毒，能覓解毒草以食。其精液積聚日久，結而為石。按《職方外記》載：‘勃泥島有獸名把雜爾，其腹中生一石，能療百病。蓋泰西呼石為把雜爾，因以名獸。’亦此石也。……考之書，蓋凡獸皆有之，名曰厝荅，治奇疾難名者。生牛馬腹中者良。……所謂鹿有玉、狗有寶者是也。然有兩種：一是鹿獸生成；一是泰西名醫至小西洋採珍藥製成。服之令毒氣不攻於心，故曰保心石，亦曰寶石。其用法以刀刮如麥大者六粒，為粉調服。多用亦無害。無病服之，亦增加精神。”⁽⁴¹⁾

“把雜爾”是波斯語或阿拉伯語的音譯，奧爾塔《印度香藥談》說：“這種石叫 *Pazar*，源自 *pazam*（公山羊也叫這個名字），當這裡的人們向你尋解毒藥時，稱這種藥為 *pazam*，獨角獸和解毒砥劑在這裡也這麼稱呼。*pazar* 這個名字，所有的忽羅珊人（*Coraçones*），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這麼叫。我們歐洲人訛稱為 *bezar*，而印度人更錯誤地稱其為 *pedra de bazar*。”⁽⁴²⁾奧爾塔認為 *Pazar* 一詞源自 *pazam*，即阿拉伯、波斯語“公山羊”，此觀點已被曼寧斯基（*Meninski*）等西方學者所推翻。⁽⁴³⁾事實恰相反，*pazar* 是解毒藥的意思，是 *pazam* 的詞源，正如《職方外記》所云。

“厝荅”在《輟耕錄》、《本草綱目》中為“鮮荅”，李時珍曰：“鮮荅生走獸及牛馬諸畜肝膽之間，有肉囊裹之，多至升許，大者如雞子，小者如栗如榛。……嘉靖庚子年，蘄州侯屠殺一黃牛得此

物，人無識者。有番僧云：‘此至寶也，牛馬豬畜皆有之。可以祈雨，西域有密咒，則霖雨立至；不知咒者，但以水浸搬弄，亦能致雨。’後考陶九成《輟耕錄》所載鮓答，即此物也。其言曰：‘蒙古人祈雨，惟以淨水一盆，浸石子數枚，淘漉玩弄，密持咒語，良久輒雨。石子名鮓答，大者如雞卵，小者不等，乃走獸腹中所為，獨牛馬者最妙，蓋牛黃狗寶之類也。’⁽⁴⁴⁾“厝答”、“鮓答”應亦源自波斯語或阿拉伯語。嘉靖庚子為嘉靖十九年(1540)，蘄州為李時珍的家鄉，今湖北蘄春縣。當時似乎不可能有天主教徒深入至中國內陸湖北，此“番僧”也許是印度來華佛教徒，故認得“鮓答”為何物。祇是不知甚麼原因，在波斯、阿拉伯用來解毒的“把雜爾”，為甚麼到了印度和蒙古卻變成祈雨之物？

由上述材料可知，保心石在元代已傳到了中國，但用於祈雨。《本草綱目》言其主治祇有“驚癩毒瘡”四字。到了清代才由西洋傳教士比較全面地介紹到中國，並且當時已有西洋醫生發明人工製造保心石的方法，不必全靠天然生成。《本草補》一書幾乎完全為清趙學敏《本草綱目拾遺》所吸收，在中國藥學史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

三、鴉片即阿芙蓉

以鴉片為成分之一的底也迦(Theriaca)在唐代已經傳入中國，製鴉片的原料罌粟在宋代已廣植庭園，作為觀賞植物兼藥用。但對中國歷史造成重大影響的鴉片約於明代才從印度傳入中國。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曰：“阿芙蓉前代罕聞，近方有用者，云是罌粟花之津液也。”李時珍解釋阿芙蓉名稱來源時說：“俗作鴉片，名義未詳。或云：阿，方音稱我也。以其花似芙蓉而得此名。”⁽⁴⁵⁾奧爾塔《印度香藥談》說：“食鴉片的摩爾人(Mouros)稱其為afiom，我們訛稱為amfiam，摩爾人之所以稱其為afiom或ofiom，是因為阿拉伯語中有很多名詞來自希臘語，……希臘人稱其為opium，而在阿拉伯語中，字母f和字母p發音十分接近，經常混淆，故稱為ofium或afium。”⁽⁴⁶⁾可見無論是鴉片還是阿芙蓉，均是希臘語經阿拉伯語演變而來。而“阿

芙蓉”譯筆兼音形兩端甚優於“鴉片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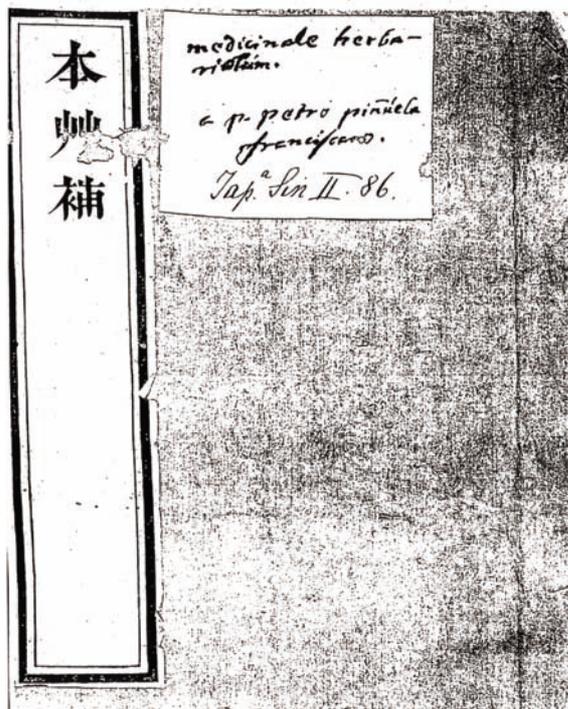
阿芙蓉語源之所以來自希臘語，是因為罌粟原產南歐、小亞細亞和埃及一帶。16世紀前半葉，印度人開始大量食用鴉片，其主要進口港為霍爾木茲，那裡鴉片主要是由埃及、小亞細亞經波斯而來，然後一部分鴉片被運至馬六甲和中國。⁽⁴⁷⁾

關於鴉片的藥用價值，李時珍祇開列治痢方三個，對當時京師流行的“一粒金丹”(由鴉片與粳米飯搗製而成)，李時珍斥為“方技家之術”。他還提到“俗人房中術用之”⁽⁴⁸⁾，這一點竟與奧爾塔的記述一樣。奧爾塔說：“以前人們用諸房中，但王侯和富商們卻不食用，即使食用，劑量也很小，而且是為了別的目的。”⁽⁴⁹⁾奧爾塔對鴉片的危害性也有所論述，說經常食用者如果停止，則有喪命的危險；而且長期服用會導致性無能，並舉了他在巴拉卡特(Balagate)的一位葡萄牙朋友為例。當時的中國人卻還沒有認識到鴉片的危害，而當清朝後期國人認識到其危害時，已恨晚矣。

《印度香藥談》中還記有多種中西交流的藥物，如檳榔、蓬莪茂、沒藥、羅望子果、寶石、薑、曼佗羅、葶澄茄、安息香、象牙、豆蔻等等。這些藥物，或是中產西傳，或是西產中傳，且均見於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，但由於基本屬於傳統的中國與西域藥物交流的範疇，故不着墨。

《印度香藥談》與《本草綱目》

李時珍(1518-1593)，字東壁，號瀕湖，湖北蘄州(今蘄春)人，我國16世紀偉大的醫學家、藥學家。初版於明萬曆十八年(1590)的《本草綱目》，至今仍在世界上產生影響。李時珍於嘉靖三十一年(1552)開始編撰《本草綱目》，成書於萬曆六年(1578)，首版以後曾多次再版。對比1534年到達印度、1563年在果阿出版《印度香藥談》的奧爾塔，儘管李時珍及其《本草綱目》略為晚出，但可以將他們歸為同一時代的人。而《印度香藥談》與《本草綱目》一西一中，是16世紀問世的兩部偉大的藥學著



作，在東、西方藥學史及世界醫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奧爾塔與李時珍的知識結構中有一個交結，就是波斯、阿拉伯及印度醫學（西域醫學）。奧爾塔在西班牙讀大學時，除希臘、羅馬古典醫學外，接受最多的便是阿拉伯醫學家阿維森那的著作。到達印度後，由於遠離歐洲正統學術氣氛，奧爾塔得以利用在印度所接觸到的波斯、阿拉伯和印度醫藥學的理论知識與實踐經驗，對歐洲古典醫學傳統特別是蓋倫醫學理論提出挑戰與修正。這一點明顯地體現在奧爾塔與其虛構人物若阿諾之間的對話當中。李時珍撰《本草綱目》亦旨在對舊有本草著作的修正，《本草綱目·序》云：“古有本草一書，自炎皇及漢、梁、唐、宋，下迨國朝，注解群氏舊矣。第其中舛謬差訛遺漏不可枚數，乃敢奮編摩之志，僭纂述之權。”《本草綱目》所收海藥甚多，而凡涉及海藥多徵引李珣《海藥本草》一書。如前所述，李珣為波斯後裔，且弟玳為海藥商人，故《海藥本草》中多載西域醫藥學知識。李時珍雖未遊西域，但足跡遠

至江西、江蘇、河南、安徽、河北等地，且注意收集海外資訊。奧爾塔與李時珍知識結構中的交結，使兩人著作中所述藥物，有許多重疊。

不僅如此，通過本文的研究還可以看出，兩部著作中開始顯露出中國與西洋在藥物方面的更為直接的交流，體現了葡人到達印度及遠東之後中西關係的新變化，即由西域向西洋的轉向。

《印度香藥談》在中國

《印度香藥談》被譯成多國文字後，其譯本，尤其是拉丁文譯本的影響，反而超過了葡萄牙文原著。拉丁文譯者卡婁羅·克魯西奧是弗蘭德人，早年在比利時根特（Ghent）大學和魯汶（Louvain）大學學習，於1559年畢業於蒙彼利埃（Montpellier）大學，獲醫學博士學位。畢業後周遊西歐各國，1564年9月至1565年1月期間居住於葡萄牙，並得到一



本艸補序

昔伏羲畫八卦以濬人之靈心神農嘗百艸以起人之瘧疾
我性又係我身上主之恩亦孔渥矣自文王周孔既遠易道不明
遂昧造化之初高者膠葛于圖象卑者附會于術數淑性之道
龐雜而莫知統宗岐伯俞拊不作鍼砭失傳唯守藥性之賦
名醫卒世罕逢三品亦非原誤保身之道紛紜而靡有效驗神
形交頽良可閔憐秦鹵石振鐸先生微言眇論別人聾瞽又以
其緒餘辨物表用攻人膏肓其哀矜神形何其竝摯也嘗謂疑
曰世人迷厥元始不知生天地人物之大主周孔詩書訓迪昭
然如日中天秦漢以後異端蠱起逾趨逾下茫然不知性命之

部奧爾塔的《印度香藥談》。⁽⁵⁰⁾從此直到去世，他共編譯出版了五個《印度香藥談》的拉丁文本，第五個版本問世於1605年。他的拉丁文譯本並非原著的直譯，保留原著中醫藥學內容和對話體的形式，而刪除了與印度生活與政治等有關的一些內容。

奧爾塔的著作為另一個葡裔非洲人克里斯托旺·達·科斯塔(Christovão da Costa)所繼承，他以《印度香藥談》為基礎，用西班牙文著成《東印度醫藥》⁽⁵¹⁾一書，於1578年出版。科斯塔於1568年9月抵達果阿，那時奧爾塔剛去世不久。科斯塔研讀過《印度香藥談》，他自己承認奧爾塔的著作是《東印度醫藥》的依據。但科斯塔的行跡要比奧爾塔廣闊，他到過馬六甲和中國⁽⁵²⁾，他的著作中也包括了一些自己的觀察。《東印度醫藥》同樣被弗蘭德人卡婁羅·克魯西奧於1582年譯成拉丁文，並附於以後幾個《印度香藥談》版本之後。

西班牙塞維利亞(Sevilla)著名醫生尼古拉·莫納爾德斯(Nicolás Monardes)與奧爾塔一起，被博克塞(C. R. Boxer)譽為兩位“熱帶醫學的先驅”。莫納爾德斯於1569年在家鄉出版《西印度醫藥》⁽⁵³⁾一書。有葡萄牙學者認為此書中的許多內容，如關於龍涎香、保心石的論述，是根據奧爾塔的著作。博克塞則持相反意見。⁽⁵⁴⁾《西印度醫藥》與《東印度醫藥》一樣，於1582年由卡婁羅·克魯西奧譯成拉丁文，也附於《印度香藥談》往後幾個版本之後。

關於這幾部藥學著作之間的關係及版本，諸家說法不一，這裡之所以進行一番概述，是因為《印度香藥談》的第五個拉丁版本、《東印度醫藥》的第三版及《西印度醫藥》的一個拉丁文本，由傳教士於明代帶到了中國，今見於《北京北堂圖書館目錄》⁽⁵⁵⁾。同條目錄中還包括卡婁羅·克魯西奧、莫納爾德斯的其它幾部醫學著作。這些書很可能是由弗蘭德傳教士金尼閣(Nicolas Trigault, 1577-1628)於1619年重返中國時帶來的。

17世紀以後，《印度香藥談》在西方仍然受到重視。一位名為雅格·德·邦特(Jacques de Bondt)的荷蘭醫生在巴達維亞行醫多年，對奧爾塔的著作

深有研究。他在巴達維亞留下多部著作，出版於1642年的《印度醫學》⁽⁵⁶⁾中第一部分便是對《印度香藥談》的注釋。⁽⁵⁷⁾北堂圖書館藏有邦特《東印度自然與醫學史》(*Historiae naturalis et medicae Indiae Orientalis*)一書⁽⁵⁸⁾，其內容很可能涉及《印度香藥談》。至於該書怎樣來到中國，則很難考證了。

明清時期，天主教來華各修會，在許多駐地都建有圖書館，並藏有相當數量的西方書籍。就現存目錄而言，據瑟利先生(Mr. Thierry)統計，19世紀後期北堂所藏書籍中，醫學和藥學類有308種，與其它科學類書籍比較，數量僅少於天文學(438種)和數學(378種)⁽⁵⁹⁾，可見傳教士在向中國輸入西學過程中，醫學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

這些書籍的存在有兩種重要意義。首先，通過將其翻譯成中文，而完成文化輸入的重要步驟。但就目前所知的情況而言，這些醫學著作譯成中文的祇有極個別的幾種，如解剖學有《人身說概》⁽⁶⁰⁾、《人身圖說》⁽⁶¹⁾兩種；藥物學有南懷仁(Ferdinand Verbiest, 1623-1688)譯《吸毒石原由用法》⁽⁶²⁾、石振鐸(Pedro de la Piñuela, 1650-1704)《本草補》⁽⁶³⁾，但尚不知道所據為何人所作；至於治療學、病理學等方面的書籍，則不見有譯本問世。奧爾塔、科斯塔、莫納爾德斯等人的著作，雖然輸入中國，但就目前所知，它們並沒有被譯成中文。傳教士翻譯大量天學著作，這是他們來華的目的，無可厚非；以治理曆法為目的的天文學著作的翻譯，數量比其它科學著作的翻譯要多得多，這體現了明清時期中國對外來文化選擇過程中的“偏愛”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。

其次，這些醫書是在華傳教士繼續學習醫學的參考，並通過學習醫學以便行醫傳教。這裡祇舉一個與本文主題有關的例子：魯日滿(François Rougemont, 1624-1676)於1658年到達澳門後，曾給荷蘭安特衛普(Antwerp)一教授寄過一個治療腎結石的方子，而他所根據的醫書就是克里斯托旺·達·科斯塔《東印度醫藥》一書。⁽⁶⁴⁾魯日滿可能在歐洲並沒有看過此書，如果在歐洲看過了，就沒有

必要等到了澳門才寄回這個藥方；他該是在澳門讀到此書，當時澳門聖保祿學院有一個相當好的圖書館。在科斯塔的書裡，共有四個可以治療結石的藥方，主要藥物分別為土茯苓、山扁豆、馬魯古木和馬尾藻⁽⁶⁵⁾，前兩種均採奧爾塔《印度香藥談》，後兩種為科斯塔新增的內容。由於魯日滿信中稱藥方為“Moluca”，則他所寄者，應為以馬魯古（Pau de Maluco）為主藥的藥方。魯日滿曾在常熟行醫傳教，“勸化入教者甚眾”⁽⁶⁶⁾，並受到中國詩人陳維崧（1626-1682）稱頌⁽⁶⁷⁾。他的醫藥學知識包括了奧爾塔、科斯塔的醫學研究成就。

【註】

- (1) Jayme Walter, *Garcia da Orta, Relance da Sua Vida*, Lisboa, 1963, p.1.
- (2) Conde de Ficalho, *Garcia da Orta e o Seu Tempo*, Imprensa Nacional, Lisboa, 1886, p.14.
- (3) C. R. Boxer, *Two Pioneers of Tropical Medicine: Garcia d'Orta and Nicolás Monardes*, The Hispanic & Luso-Brazilian Councils, London, 1963, p.8-9.
- (4) 完整書名為 *Colóquios dos Simples, e Drogas da India, e assi dalgumas frutas achadas nella onde se tratam algumas cousas tocantes a mediçina, pratica, e outras cousas boas, pera saber cōpostos pello Doutor garçia dorta: fisico del Rey nosso senhor, vistos pello muito Reuerendo senhor, ho liçenciado Alexos diaz: falcam desenbargador da casa da supricaçã inquisidor nestas partes, Goa, 1563*. 本文的寫作根據菲卡略伯爵（Conde de Ficalho）的校註版本，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 por Garcia da Orta, Imprensa Nacional, Lisboa, 1891.
- (5) Conde de Ficalho, *Ibid.*, p.367-383.
- (6) Lejeune, *As Contribuições de Portugal para a História da Medicina*, Lisboa, 1938, p.9.
- (7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260.
- (8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159.
- (9) [明]薛己氏：《外科心法》卷六“草薺湯”條。
- (10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I, p.260.
- (11) Conde de Ficalho, *Ibid.*, p.294.
- (12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I, p.115-116, Conde de Ficalho 的注釋。
- (13) [明]俞弁《續醫說》“草薺條”云：“弘治（1488-1505）末年，民間患惡瘡，自廣東人始；吳人不識，呼為廣瘡，又其形似，謂之楊梅瘡。”
- (14) 參見（明）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十八〈草部〉七，土茯苓條。
- (15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I, p.275-277.
- (16) Pedro José da Silva, *Elogio Histórico e Noticia Completa de Tomé Pires*, Lisboa, Typ. Franco-Portugueza, 1866, p.38, 附錄。
- (17)（明）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十四“草部”三，高良薑條。
- (18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353, 354.
- (19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353.
- (20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357, Conde de Ficalho 的注釋。
- (21)（明）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三十四“木部”一，樟腦。
- (22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166, Conde de Ficalho 的注釋。
- (23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156-157.
- (24)（明）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三十四〈木部〉一，龍腦香。
- (25)(26)（明）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三十四〈木部〉一，龍腦香，“集解”。
- (27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156.
- (28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206-207.
- (29)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214.
- (30)(31)（明）參見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卷三十四〈木部〉一，桂、牡桂；天竺桂。
- (32)(37)參見馬伯英、高曦、洪中立著：《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——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》，文匯出版社，1993年，頁

- 231 ;頁213。
- (33)(38)李經緯主編：《中外醫學交流史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129-130；頁137。
- (34)參見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210, 320, 382; vol.II, 72, 248, 258, 276, 279.
- (35)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46.
- (36)(明)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十三〈鱗部〉，龍。
- (39)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, p.52.
- (40)參見金國平、吳志良：〈龍涎香與澳門〉，《鏡海飄渺》，澳門成人教育協會，2001年，頁38-50；金國平、吳志良：〈澳門歷史的“香”“煙”論〉，《東西望洋》，澳門成人教育協會，2002年，頁129-154。
- (41)石振鐸：《本草補》，影印本見鍾鳴旦(Nicolas Standaert)、杜鼎克(Adrian Dudink)編：《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》第12冊。
- (42)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I, p.233.
- (43)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I, p.236, Conde de Ficalho 的注釋。
- (44)(45)(48)(明)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五十〈獸部〉一，鮓答；卷三十二〈穀部〉二，阿芙蓉；全前。
- (46)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I, p.173.
- (47)參見 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I, p.179, Conde de Ficalho 的注釋。
- (49)Garcia da Orta, *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India*, vol.II, p.171.
- (50)C. R. Boxer, *Ibid.*, p.25.
- (51)Christovão da Costa, *Tractado de las drogas y medicinas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*, Burgos, 1578. 本文的寫作根據傑梅·華特(Jaime Walter)校注, *Tratado das drogas e medicinas das Índias Orientais* por Christovão da Costa,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, 1964.
- (52)Conde de Ficalho, *Ibid.*, p.387.
- (53)Nicolás Monardes, *Dos Libros, El Uno Qve Trata de todas las cosas que traen de nuestras Indias Occidentales, que siruen al uso de la Medicina, y el otro que trata de la Piedra Bezaar...*, Sevilla, 1569.
- (54)C. R. Boxer, *Ibid.*, p.21-22.
- (55)Mission Catholique des Lazaristes à Pékin, *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-T'ang, Pékin*,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, 1949, Société d'Édition 'Les Belles Lettres', Paris, 1969, pp.585-586.
- (56)Jacobi Bontii, *Medicina Indorum Lib. IV*, Lugduni Batavorum, 1642.
- (57)Conde de Ficalho, *Ibid.*, p.385.
- (58)*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-T'ang, Pékin*, p.723.
- (59)H. Verhaeren, *Aperçu historiq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-t'ang*, in *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-T'ang, Pékin*, p.XXXI.
- (60)參見郭文華：《〈泰西人身說概〉初探——以畢拱辰與其成書為中心》，載龍村倪、葉鴻灑主編《第四屆科學史研討會集刊》，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，南港，1996，頁85-106。
- (61)參見鍾鳴旦(Nicolas Standaert)：〈昂布魯瓦茲·帕雷《解剖學》之中譯本〉，載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第21卷，第3期(2002)，頁269-282。
- (62)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, *Chinois 5321-22*. 尚藏有一滿文譯本，參見 Lode Talpe, 'The Manchu Text of the Hsi-tu-shih or Lapis Serpentinus', *Orientalia Lovaniensia Periodica* 22 (1991), pp.215-234.
- (63)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, *Chinois 5332*; Jesuit Archives in Rome, *Japonica-Sinica II*, 86.
- (64)Noël Golvers, *François de Rougemont, S.J., Missionary in Ch'ang-Shu(Chiang-Nan).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(1674-1676)*,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&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, 1999, p.530.
- (65)Jaime Walter, (introdução e notas), *Tratado das drogas e medicinas das Índias Orientais* por Christovão da Costa,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, 1964, pp.54, 87, 223, 241.
- (66)[法]費賴之著、馮承鈞譯：《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》上冊，中華書局，1995年，頁337。
- (67)陳維崧：《湖海樓陳迦陵詞全集》卷十二，〈贈大西洋人魯君〉。

(2003年5月24日完稿於里斯本)